

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实践和理论创新^{*}

杨承训

【内容提要】 公有制经济蕴含着巨大的活力，如何运用有效的实现形式释放出来，以往的经典作家未来得及解决。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创造了公有制多种灵活高效的实现形式，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过多年创新探寻，国有经济、集体经济采取了诸多新的实现形式，充分解放了生产力。我们应当深化研究，揭示其内在的必然性和应遵循的原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新境界。

【关键词】 公有制实现形式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作者简介：杨承训（1935-），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经济学会会长（河南郑州 450046）。

我们纪念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需要深化认识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①这一伟大觉醒回答了前人想解决而未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难题，其中之一就是公有制经济如何既能保持不变质又充满活力，迸发出能够超越任何私有制形式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创造出使公有制潜在优势化为实际持久优势的诸多灵活多样的实现形式，又使抽象的原理转化为具体的运作形式。这也属于从认识到实践、从一般到特殊的“更伟大”的“飞跃”。

一、公有制与其实现形式的辩证逻辑和历史逻辑

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优于一切私有制经济，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全人类解放和共同富裕的理想出发，通过实际对比，尤其是从揭露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可克服的矛盾中，得出的科学结论。这个原理从具体到抽象，是完全正确的，必须永远坚持。不过，公有制的优越性怎样发挥？当时还没有具体的实践经验，不能凭空想象具体形式，只能做一般概括。所以，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课题只能留给后来人去探寻。

从辩证法视阈认识，任何事物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一定的内容必须由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内容和形式是辩证法的一对基本范畴。内容是事物一切内在因素的总和功能，形式是其内容要素的结构、组织方式和功能运作的具体路径、手段、形态。内容是事物的本质规定，在特定事物的本质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研究”（20AZD011）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页。

未改变以前，其内容（内涵）是不会改变的。一般说来，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也反作用于内容。马克思说：“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①同时，恩格斯也批评了只注重内容而忽略了形式的错误倾向^②。不过，形式和内容又不完全一致，一种内容需要有多种表现形式，一种相同的形式也可以表现不同的内容。总之，内容和形式是辩证统一的，二者相辅相成。

列宁说：“任何人民运动都有千变万化的形式，要不断创造新形式，抛弃旧形式。”^③毛泽东精辟论证过战争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其内容有革命战争、反革命战争、反动派的混战等。其形式则非常之多，有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等之别，从时间上看又有持久战、速决战等。内容反映战争的宗旨和性质，形式则表现战争的手段、方法、态势、时空等。没有内容的战争是不存在的，没有形式的战争也无法实现战争的目的。

在内容确定之后，创造实现内容的形式则是主要任务，并有一定的难度。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这是内容。但暴力革命的形式则是多种多样的。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是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长期农民战争，与经典作家设想的城市暴动不同。在这里形式就十分重要，没有这种特殊的形式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探寻具体战争的形式就是制胜的关键。在一定条件下，形式卓越也可充实内容，提升质量。

关于社会经济，马克思讲了“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是普遍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不同^④。社会经济中的生产关系也是如此。如私有制是内容，它的一级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而这些制度在一定历史阶段便成了内容，它们又有更具体的二级形式。如封建所有制有地租、农奴份地、封建地主直接经营等形式，到资本主义时代又演变为地主占有土地（产权）与资本主义经营（经营权）结合的形式。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形式在市场经济下则更加呈现多样化。社会主义公有制，最早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内容（原则），是生产资料社会所有，旨在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他们从当时欧洲的生产力水平出发，设想的是社会所有，即国家所有制（恩格斯说全部生产资料归国家），连“集体所有”也还未具体设想。（《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到“集体”，实际是全社会的大集体；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讲了合作社，但强调发展为“全国大生产合作社”^⑤。）列宁从俄国的实际出发，提出合作社为“集体企业”（《论合作社》），后来斯大林概括为公有制的两种基本形式：全民所有制（国有）、集体所有制（集体农庄）。这还是一级形式。列宁在研究土地问题时，讲过产权产能多种形式。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试用过国有制多种具体形式，如国家直接经营的有托拉斯、辛迪加，混合型的还有部分股份制、公私合营、与国外资本合资、租赁等，但未形成系统理论，当时只是一种初步探索。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运用过许多所有制形式，但当时处在民主革命中，公有制经济还不占主导地位。在过渡时期创造了许多和平改造的形式，如对民族资本使用过加工订货、包购包销、公私合营等形式，引导农民由互助组到入股的合作社再到土地公有的高级合作化，比较成功，但后来形式又单一了。总体上看，在我国改革开放前，虽然有了一些设想和试验，但并不系统，也没形成完整的理论概括，真正的全面实践和系统理论是在40多年改革开放中形成的。

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视阈考量，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创新，是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8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7页。

③ 《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3页。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3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领域。它把公有制的内容和多种具体形式辩证地统一起来，这些形式能够切实发挥公有制优势的重要作用，是便于采用的灵活形式，既体现公有制共同富裕的本质，又是促进现实生产力发展的高效形式，为群众所欢迎，并在新时代显示很强的适应性，不会僵化，可通过改革深化不断更新，实现自我完善。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这是崭新的理论成果，也是在继承几代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取得的重要建树，克服了墨守成规、单调僵化的弊端，对于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大功效。

毛泽东说过：“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①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深化认识实现形式对优化公有制的重要性、必然性。在方向、内容确定之后，采取有效的实现形式，就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是改革的重要任务。苏联的教训之一，就是没有能够找到真正高效的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实践经验还表明，我国成功的原因之一，正是在改革开放中找到公有制高效灵活的多种实现形式。

怎样才能找到公有制高效、适应性强、便于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的灵活多样的实现形式呢？历史证明，不能靠主观想象，也不能靠从本本上套用现成的公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②这是靠运用马克思主义，靠改革实践探寻，靠群众集思广益的创造。

从完整的意义上说，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广义的包括宏观经济运行形式，如选用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观运行形式包括区域间协同发展的体系等。狭义的主要是讲微观运行形式，即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所采取的经营形式，本文着重分析微观的实现形式。

二、国有企业：从赋予“独立性”到多种经营组合形式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过两种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实践告诉我们，优化经营实体要处理好五个关系：一是生产力中劳动者与生产工具（技术水平）以及生产对象（包括加工、耕种、开发等对象）的关系，二是企业同宏观经济、市场的关系，三是横向企业之间的协同关系，四是内部全体员工、各层阶的分工、责任、利益关系，五是统筹考虑形式创新与防范风险的关系。总体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要求。

国有企业的多种实现形式，经过两个阶段嬗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工厂、铁路局、交通、商业等）要变成真正的企业。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借鉴苏联模式，国企经营单位虽然也称之为“企业”，但没有独立性，属于社会“大工厂”下的一个“车间”，经济上统收统支，利润全部上交，不纳税，连折旧费也是统管的；生产上按计划完成下达的任务，产品统一定价、统一销售；人事上统一分配调动；分配上也全国统一标准（八级工资制）。只能说当时公有制还处于胚胎阶段，企业缺乏活力，好像算盘子儿，拨一拨动一动。而改变这种状况，有一个长过程。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9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76页。

毛泽东早就发现这一弊端的严重性，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专门谈了“以苏联为鉴”，扩大企业独立性问题。他说：“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①几年后又进一步总结经验，指出：“中央部门管的和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②

然而，这个问题真正得到解决还是改革开放后的事。首钢是增强企业活力的试点，实行利润包干制，完成上交定额后，留下的利润由企业使用。这一做法大大增加了企业的活力，随后首钢利润包干的经验在全国推行。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国有企业是改革的中心，要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经营者，但仍将企业定为相对独立的单位。接着，实行利改税、拨改贷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活力大大增强。但价格没有放开，国有企业呼吁要求进一步“松绑”，参与市场竞争。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活力迸发的好典型。在非公有制企业出现之后，国企由于包袱沉重，特别是企业办社会、债务积累过多，仍然活力不足。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1993年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仍然以国企改革为中心，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探索公司制改革，开始抓大放小。接着，通过推进企业放包袱，解决三角债问题，宏观上放开价格，整治乱收费等措施来增强企业活力，但国企发展仍面临许多障碍。1999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实行“抓大放小”，要求国有大企业采取多种形式，特别是进行公司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机制，对中小企业实行改制（在此过程中，个别地方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后来中央逐步予以纠正）。这是国企改革的重举措和步骤。2003年，中共中央进一步作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将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政府不再干预企业经营活动，进一步使国有企业成为完全独立的市场主体，以便进一步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在企业拥有独立性的基础之后，又进一步探索面向市场的多种形式。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③主要进行了如下的一些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处理好党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进一步建立健全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完善管理人员选用和退出机制，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建立健全差异化薪酬分配制度，探索推进员工持股等各类中长期激励方式；有效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功能作用，在授权经营、结构调整、资本运营、激发活力和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调整职能定位；扎实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进一步扩大混合所有制改革范围，在重点领域持续深化推进改革试点，保障各类社会资本公平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权利，切实把引进社会资本和转换经营机制有机结合起来。现已形成下述具体实现形式。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8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6页。

(1) 从企业规模上实行资产重组,形成大的综合性的公司。目前央企已由原来的300多个企业合并改组为90多个企业,形成集中经营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大企业集团,其中60%以上成为世界“500强”,2019年中国成为世界上大型企业(“500强”)最多的国家。大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主干作用,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市场的供求关系,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微观观点,也是重大创新的主体。

(2) 从企业内部治理体制上完善公司制,设立党委领导下的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处理好总公司、分公司的关系,更灵活地适应市场变化和国际竞争,推动国内外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形成和提升。职工(包括管理层)收入能多能少、干部能上能下、劳动者能进能出,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铁饭碗、大锅饭”,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与责任制紧密结合的原则,包括以市场化形式聘请专业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建立健全差异化薪酬分配制度。

(3) 从吸收多样成分结构上创造了立体联合的形式,主要采用入股的方式。

——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跨区域地方企业与地方企业混合改革。虽然都是国有经济,但主管部门层面不同,双方扩大受益结成跨区的产业链、供应链。

——职工入股国企,企业中含有了集体成分。这有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增强凝聚力。

——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互相入股,有的国企入股非公企业,也有非公成分入股国企。从广泛的意义上看,国有企业上市也是吸收个人或其他成分的投入。这不是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失,化公为私),而是增强企业的活力、竞争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利用非公有成分在市场上的应变能力,促进市场化改革,也有利于克服国有企业某些行政化的弊端。从长远看,还有利于非公有经济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要求,提升社会责任。有人担心,非公有经济会吃掉公有股份,就绝大多数来讲是不会的,因为国企有党的坚强领导,经营资产总量占绝对优势,加上严格的制度保证,能保持总体的主动权,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比如,国有云南白药集团也吸收非公经济入股,主要是吸取它们开拓市场的长处,不但没有削弱国企的优势,而且进一步提高了该集团占领国内外市场的能力,放大了名牌效应。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中国国有经济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有2/3的中央企业引进了各类社会资本,各省区市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达到49%。中央企业混合改革比例达70%,较2012年提高近20个百分点,而在参与混改的企业中,约有70%的混合改革企业利润获得较大增长。

——引进外资入股,主要适用特殊企业,旨在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其前提是有足够的掌控能力。

对于混合经济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①总的来说,国有企业适应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国内外市场竞争与各类链条的沟通多样化、多边化,提升自身的质量和巨大活力,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企业成分,成为国内大循环的稳定器和占领世界制高点的利器。到“十三五”末,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218.3万亿元,较“十二五”末增长82.1%^②。当然,目前国有企业仍有许多困难,如债务过重、创新能力不足,像华晨集团那样的大企业也陷入破产困境,以

①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② 《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资产总额超218万亿元》,《经济日报》2021年1月19日。

沈阳机床厂为首的机床制造企业“十八罗汉”陷入严重亏损。这也需要继续深化改革。

三、城乡集体经济适应生产力具体要求的多种灵活高效实现形式

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的一种基本形式，它同国有企业不同，不是归全民（社会）共有，而是一部分劳动群众共有，也是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由于它适应了生产力具体形态多样化，其产权结构、实现形式就更加多样化、链条化。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大体分三类。

(1) 集体工业企业。主要在城市，也有一些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或独立的工业企业。其实现形式主要适应各类工商、服务型的企业，资产所有权归集体，而其经营形式有的以集中劳动为主，也有分散性劳动的。集体工业企业中，规模比较大的有青岛的海尔、深圳的华为等。海尔从小型集体企业发展为生产家电的大型名牌企业，其内部基于科研水平不断提高，形成集中劳动和相对独立的分散劳动相结合，内部不固定于一个模式，分块管理，统一经营。华为对外自称为集体所有制，内部实行较为均等的股份制，99%的股份属于职工，1%的股份属于创业者和负责人（法人代表），而且退股自由，内部分配为按劳动贡献（工资）、按股分配（多为期权股）和创新奖励三种类型，类似股份合作制。而相当多的城市与农村集体工业已逐渐由集体共有走向集体共有与成员持股相结合，相当于公有制与个人所有制的混合，其中也吸收部分不参股的劳动者（领取工资）。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形成大量的手工工艺合作社和其他专业合作社，多数采取股份合作。所有这些集体企业的实现形式，基本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个人财产性分配为辅。

(2) 以商业、服务为主的集体企业。最大的是具有全国系统的农村供销合作社，由解放区分散的供销社起家，逐步形成正式固定统一的集体经济机构；改革开放后实行上层（县级以上）集中经营与下层承包经营相结合，职能是为农村农业农民服务，县级以上的干部由政府任命。与此类似的还有农村信用合作社，多数由农民入股统一经营，现在实际上已成为农村银行，干部由政府任命，经济上是国家与集体共有，农民股份已微乎其微，也有统一的领导体系，但不属于国家与地方银行系统，而其业务由银保监会监管。

(3) 最大量的是农业集体组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于农民承包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属性的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成果^①。历史地看，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十分特殊、相当困难、极其复杂的工程。经过近70年的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基本框架已经廓清。我们提出的基本要求是：“要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②这就是多种链条密织的现代农业生产力同与之相适应的集体所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有机结合，可谓现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的基本形式，也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大创新。历史地看，中国农业集体化经历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和邓小平所说的农村改革“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实行集体所有与分户承包双层经营体制，现在逐步探索构建“三权分置”的实现形式，正在向“第二次飞跃”（现代农业和新集体经济形式）迈进。其产权形式呈现典型的多样化、链条化，是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和我国农村特殊性“双重个性”出发的崭新创造。

① 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

②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5页。

核心的一条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为集体所有，坚持公有制。在这个前提下适应农业生产和我国农村的“两个特殊性”：第一个“特殊性”是农业生产本身既是经济再生产又是自然再生产，它与工业不同，其生产的对象是有生命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其生命周期中有自身发育阶段，不需要生产者不间断的劳动（很大程度上是监护），这就决定了不需要全程集中性劳动，而是分散经营与集中经营相结合、相交叉，相应的经营方式必须更灵活，集体劳动的形式并不能提高劳动效率。正因这样，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解放出大量的劳动力。第二个“特殊性”，是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同西方人少地多差异很大，西方人均耕地几十亩上百亩），而全国城镇化水平低，农民单靠人均一亩多地（南方只有几分地）是富不起来的。而推进城镇化，使农业人口变为城市人口、农民变为工人专业从事工业和服务业，有一个过程。总量上必须减少农村人口、宏观上必须增加土地资源。由此而来，我国农业全面实现规模性的现代化也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大量的分散经营将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正是基于这种实际情况，为确保农民利益（包括大量一边打工、一边种地的兼业农户，其栖居地仍在农村），集体经济形式采取土地所有权、家庭承包权、大户经营权“三权分置”，还有大量的农村劳动者在流动中转化为市民。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也是适应实现城镇化的要求。现在虽然出现一些新的农业集体经营形式，还有少数富裕的工业化集体经济村庄，但还不可能全面覆盖所有农村。而复合型的集体经济实现形式正是世界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是一个独到的创造。

依个人所见，农业真正全面实现适应以高科技为支撑的现代化规模经营和高端生态化，还需要八个充分条件：第一，农业人口减少到3亿以下；第二，发展和运用农业高科技进一步提高集约化，实现高端生态农业（如以休耕涵养地力、健全高端海绵耕地体系）；第三，宏观上扩大农业土地资源（包括耕地、林地、草原等），需要西部大开发和中东部挖掘土地潜力（复耕与改造盐碱化地等）；第四，进一步提升城镇化水平和提升乡村振兴水平，农村居民适当集中，全面实现现代化；第五，扩大以绿色发展为主旨的大农业循环经济实体；第六，提高农民素质培养大量的职业农民产业军；第七，宏观上要进一步增强以工补农的力度，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第八，适当通过对外贸易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这样一个巨大系统工程实现世界农业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化石农业为第一次产业革命），不仅彻底解决吃饭问题，而且提供全面的生态环境和生物资源（如生物能源、高级有机肥料、农产品多层加工等）。适应这种农业生产力的提升，还需要在深化改革中探索更加高效完备、更多样化的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彻底实现邓小平所说的农村改革“第二次飞跃”，带动人类进入高端生态农业新阶段，这将是更大的创新。

此外，在改革开放和高科技发展中，除了国企和集体经济之外，还创造了更新的公有制形态和趋向公有化的经济形态及其多种实现形式。目前由于产学研结合，在科技创新中出现既非国有也非集体所有的公有制企业雏形。例如科研单位、高校为实现科技创新与转化一体化的附属企业，属于单位所有的公有制；有的是科研单位、高校与企业联合创办的合作企业；有些科研团队领军人物创办创新型小企业，生产资料主要是“知识产权”，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这种“小巨人”企业同私人企业不同，也不完全是集体企业，而是一种准公有制；还有由慈善事业单位举办的支持慈善经费增殖的中小型企业，也属于这一类。这就是由于科技创新主导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耦合产生的公有制、准公有制新生代，也是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创新。预计以后还会大量出现。当然，有些科学研究企业也会发展为大型私人企业或股份制企业，应当加以引导管控，不能脱离社会主义轨道，形成新的私人大垄断型企业。

现在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创造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呈现五彩缤纷、百花齐放之势，焕发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今后的实践还会有新的创造，需要突破老框框在理论上加以总结升华。

四、创新公有制实现形式需要掌握的基本原则

如前所述，在实践中探寻公有制灵活多样的实现形式，是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大创新和历史贡献。对于这一方面的理论研究尚待深入。这就需要立足实践阐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初步梳理，应当注重对以下原则进行研究。

第一，公有制实现形式原理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拓展，核心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往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理论，多限于所有权层面，一般不涉及其实现形式；在内容和形式的辩证法范畴中也未成为重要具体的实际支撑点，更未进入政治经济学体系。仔细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把关于国有企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和关于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理论，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1 个创新点之中^①。这是以前的经典作家未曾提出和论证过的。现在我们党已经有多年丰富的实践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历史经验，亟须形成系统理论观点，用以指导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践，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本质。

第二，必须划清公有制采取多种实现形式同将公有制生产资料私有化的界限。有些同志以为非公有经济发展或与非公有制联合经营（如多种所有制混合改革），就是私有化。这里有几个界限：公有制经济处于主体地位关键是能够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农村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是公有的（这是决定性的）；私有化的特定含义是化公为私、公有资产流失，这种倾向总体不存在（个别现象不是主流），国家采取了严厉措施，堵住了私有化的漏洞；私有制企业是区分多层次的，我国对大型私有经济加以限制、调整（利用税收、法律等），制止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使之不能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中小企业也加以法制管理和引导，个体经济则属于劳动者所有，目前对扩大就业开辟了很大的空间。总体上对非公有经济是鼓励与引导相结合，作为统战对象，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并规定了劳资两利的政策，千方百计保护劳动者权益。所以，不能把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与私有化笼统地等同起来。当然要注重保护公有资产防止流失，对此，已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一系列政策。特别是加强党的领导，保证了公有制多种灵活的实现形式不变质、不出轨。目前正在进行的反垄断和防止资本主义无序扩张的举措，具有深远的意义。

第三，继续通过不断深化改革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创造不是随意的，不是搞花样形式主义，而是有原则、有标准的。1992 年，邓小平说过：“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② 从根本上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其途径是鼓励在实践中创造，特别是群众的创造。要允许大胆试验、慎重改革，逐步推广完善。这是我们党多年的工作方法。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现在还不能说都已经完善了或者说改革可以停止了，实际上还有许多未知的东西和更多的好形式。这就要以问题为导向，针对有碍于生产力发展、科技创新、群众积极性提高的环节，通过改革边创新边完善，使得公有制经济日益增加活力。

第四，扬弃旧形式防范新风险。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经营形式、管理方法，也不要采

^① 参见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 年 8 月 25 日。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72 页。

取一概排斥的态度，要善于辩证地扬弃，吸纳采取其优点，摒弃其弊端，防止走邪路，也就是洋为中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历的几百年时间，创造了许多经济形式和管理方法，有不少反映了现代社会化生产的普遍规律，可以拿来加以扬弃改造，为我所用，而不能生搬硬套、兼收并蓄，搞西化。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已采用西方市场中的不少实现形式，比如资本市场、期货市场等，我们尚缺乏管理经验，需要慎重试用、严格管理，在实践中总结经验，进一步创新，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风险是可能的，必须加强防范；但不能因噎废食，应采取积极态度加以改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告诫要防范金融系统风险，对此必须高度注意，使这些实现形式发挥正常的功效，而不能损害社会主义原则。现有多种实体经济形式也要防止变质的风险，不能违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第五，遵循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原理，需跟踪研究新型生产力的变化，使得公有制实现形式更好地为提升经济质量服务。不能脱离生产力水平只讲公有制高级化，同时跟上生产力进步的要求。比如，由于信息化、网络化、数字经济、云技术、大数据及各种智能化手段进入生产、物流、信息流各个领域，将会改变许多原有的经营形式，形成与国外衔接的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公有制的相关实现形式会重构，有的可能更多地与多种成分的资本交叉。股份制的经营结构出现多层次交错，有的出现立体式多学科多业务多层阶的企业组织形式。这就需要增强管理能力、适应能力，增加现代化知识和法治水平。再如，绿色发展已成时代的主题，如何既保证供给侧结构的提升，又保证生态环境的改善，构建公有制主导的生态链与产业链交叉组织结构，这就需要更加适应现代化与绿色化双层型的实现形式，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很可能形成新型以公有制主导的多种成分融合的合作组织。这些都是现代化带来的新课题。根据历史唯物论的原理，生产力是最终决定因素，单靠原始的公有制固化模式会束缚生产力，必须在改革中创造新的实现形式，以适应和推进新生产力的发展。

第六，发展完善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必须加强党的具体领导。比如，在多成分交叉中如何保证公有资本人格化，必须依靠党组织起神经中枢的作用，加强引领和监督机制，处理好管人与管事的关系，强化反行贿和受贿的机制，提升干部的政治治理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也是公有制市场主体不变质的保证。在发展和创新公有制多种灵活经营形式中，要加强这个“中枢神经”的系统建设，探寻有效的具体组织形式和政治教育形式。总之，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创新和运行既能带来活力，也会带来风险，要贯彻勇于创新 and 防范风险的统筹原则，不可减弱、失去警惕性。根本的一条是依靠发挥党的领导优势，使得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不断提高质量，更好地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 [2]《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 [3]《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 [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 [5]《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编辑：张建刚）